

我国银行监管机制的博弈分析

刘黎平¹, 许晨超²

(1.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中国人民大学 财政金融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 2008 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上的不足, 加强金融监管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在我国, 银行业在金融业中一直占主导地位, 对商业银行进行合规性监管仍将是现实情况下我国银行监管的重要内容。文章针对我国银行监管现存的问题, 建立监管的博弈模型, 得出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并从完善监管的法律体系、规范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建立监管者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国内银行资本监管制度等方面对我国现行银行监管制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金融危机; 银行监管; 博弈模型; 纳什均衡

【中图分类号】 F8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768(2013)07-0036-04

2008 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等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上的不足, 加强金融监管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2010 年 7 月 21 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金融监管改革法案, 使之成为法律, 标志着美国加强金融监管方面掀开了新的序幕。2010 年 9 月 12 日,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就旨在加强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协议 III》达成一致, 以期通过要求金融机构提高资本充足率下限, 抑制金融机构的过度投机行为, 并增强金融机构应对损失的能力, 各国对银行业安全的关注可谓史无前例。新形势下我国如何对银行业进行监管?

虽然目前出现了大量研究我国银行监管机制的文献, 但从博弈论的视角来研究银行监管机制的文献不多。本文旨在从监管部门、银行之间博弈的行为来分析银行监管的机制, 他们博弈的最终结果即为银行监管制度的最终选择。

一、银行监管相关研究简要回顾

对银行监管机制的早期研究主要是从信息不对称的视角开展的。其中 Akerlof(1970)、Stiglitz 和 Weiss(1981)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由于银行体系中的信息不对称, 即使主观上愿意稳健经营的银行机构, 也可能随时因信息问题而陷入困境。信息不对称事前表现为“逆向选择”, 即高品质的从市场退出而差的却充溢市场, 在市场上则表现为信贷配给和不完全竞争, 其事后表现为“道德风险”问题, 如果短期内从银行攫取的好处比银行作为一个持续运转的实体更有价值时, 还有一定净值的银行就可能被瓜分。Bhattachary et al(1998)回顾了银行和银行监管理论对设计最优银行监管体系所具有的参考价值, 特别是重点分析了银行安全网所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Hart 和 Moore(1999)提出的不完全契约理论为理解银行监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由于私人签订的契约总是不完全的, 市场自身力量的发展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完全问题, 而且契约的有效性依赖于法律制定和执行效率。Freixas 和 Santomero(2002)就信息不对称理论框架下银行监管理论的发展进行文献综述, 重点分析了银行安全网为什么是银行监管的核心内容以及如何设计最优的安全网。

相比之下, 从市场约束和激励相容视角对银行监管机制进行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进入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 美国储贷协会惨重失败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对于政府监管失灵以及银行安全网设计过程中引发严重道德风险问题的探讨, 市场约束在银行监管中的地位被重新认识, 如何在官方监管中引入市场约束成了讨论焦点。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市场约束作为有效银行监管“三大支柱”之一则是对这一讨论最好的呼应。Flannery 和 Sorescu(1996), Bliss 和 Flannery(2002), Hamalainen(2004)讨论了何种市场投资者才能确认和控制与银行相关的风险, 并指出市场约束要发挥作用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市场监控存在, 即利益相关者能正确理解银行风险特征的变化并将这些评价考虑到银行债券价格或贷款利率中去; 二是市场影响存在, 即债券价格及贷款利率变化使银行管理者作出反应, 采取措施来减轻和改善银行经营环境的不利变化。Flannery(1998)认为在原有官方监管中吸收一些市场所提供的信息可以提高监管效率, 市场约束可以弥补官方监管信息滞后问题, 有利于提高银行监管效率。Goodhart 等(2001)对世界各地发生的银行危机的研究表明, 在公司治理、法律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的国家, 政府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督无法有效地保证银行体系的稳定, 这说明监管很难解决银行体系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市场力量既可以作为政府监管的替代机制直接控制银行的风险, 也可以作为一种政府监管的补充机制发挥有益作用。例如, 市场能够为政府监管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市场信息也会促使监管部门采取“及时改正行动”(prompt corrective action, PCA), 减少监管人员对问题银行的“宽容”行为。通过市场力量约束银行的风险近年来引起了经济学家浓厚的兴趣。市场约束的机制主要有两类: 强制信息披露和发行次级债券。

Kane(1977, 1984, 1990, 2002)认为监管低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监管当局提供监管的激励不足, 他指出, 纳税人与其代理人的代理问题和监管者的激励问题是正确理解银行业过去与将来监管的关键, 在对银行业的监管中, 同样存在导致“激励

【收稿日期】 2013-01-30

【作者简介】 刘黎平, 男,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金融学; 许晨超, 男, 北京人,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问题”的两个基本条件:当事人目标函数的不一致和信息的分散化,这体现在两个层面:存款者(委托人)与监管者(代理人)之间,作为监管者的监管当局和被监管的商业银行之间。巴曙松(2003)认为,从博弈论角度来看,激励相容监管是把监管过程看做一个特殊的委托—代理问题。蒋海、刘少波(2004)通过建立存款人与监管部门、监管当局与金融机构三方的监管博弈模型,表明不同的信息结构决定着不同的监管激励水平,从而直接影响着监管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信息不对称程度愈大,监管激励水平愈低,监管效率也就愈低。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中的主要问题也正是监管者及金融市场的透明度较低而缺乏监管激励所致。因而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从宏观层面加强或放松金融监管,而在于如何通过监管当局及金融市场的信息透明度建设为微观监管主体提供有效监管的激励。纪敏(2005)也认为,激励相容或正向激励的监管,实质是在金融监管中更多地引入市场化机制。

二、银行监管的博弈模型分析

在我国银行监管体系中,银行监管当局(主体为银监会)与各商业银行之间是信息不完全的非对称博弈关系。基于“新经济人”的行为基础,银监会与商业银行这两个博弈主体均存在着如下特征:(1)动机的双重性。人们往往会在财富最大化和非财富最大化之间进行权衡以求最佳均衡点,行为的差别在于收益较成本的差异;(2)有限理性。环境的复杂多变使人们不可能无所不知;(3)机会主义倾向。人都有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

在此假设下,银监会和商业银行都是理性的,都会在博弈中选择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策略。银监会作为银行监管机构,虽不具有追求自身财富利益最大化的欲望,但却有以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通过实施有效监管,最大限度地维护银行系统正常运转的非财富效用最大化的动机,也就是追求监管的效率。同样,商业银行在追求自身财富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除了考虑一般性的交易成本外,还得考虑其机会主义行为被查处所带来的声誉损失以及被暂停或取消从业资格而导致的经济损失。本文通过构造博弈模型来分析探讨我国银行监管问题。

(一)银行和监管部门之间的一次性博弈

1.模型设计。模型假设:(1)博弈的参与人为银监会与商业银行。(2)博弈双方的策略空间是银监会:监管,不监管;商业银行:合规经营,违规经营。(3)博弈双方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商业银行相对于银监会有信息优势,银监会对商业银行实施监管必须付出成本。(4)假设银监会实施监管,肯定可以发现商业银行是否存在违规行为。当发现商业银行违规经营时,可采用没收违规所得、罚款、停业整顿等措施。商业银行合规经营时,银监会只付出成本,没有收益。(5)在这个博弈中,假设C表示银监会实施监管的成本,F1表示商业银行合规经营取得的正常收入;F2表示商业银行违规经营所取得的除正常收入外的额外收入,若银监会实施监管,F2将被没收,F3表示商业银行违规经营被查处后受信誉下降影响后取得的收入,显然 $F_3 < F_1$,P表示商业银行违规经营被查处后受到的罚款,L表示商业银行违规经营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福利损失及对银监会声誉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引入监管博弈模型,并用支付矩阵表1表示。其中支付矩阵中第一个代数式表示银监会的得益,第二个代数式表示商业银行的得益。

表1 银行与监管部门之间的一次性博弈收益矩阵

		银行	
		合规经营	违规经营
监管部门	监管	$-C, F_1$	$F_2+P-C-L, F_3-P$
	不监管	$0, F_1$	$-L, F_1+F_2$

2.模型求解。从支付矩阵可以看出,如果银监会选择监管,因为 $F_1 > F_3$,所以 $F_1 > F_3 - P$,显然商业银行选择合规经营,如果银监会选择不监管,则商业银行会选择违规经营,商业银行不存在占优战略。同样,如果商业银行选择合规经营,显然银监会选择不监管;如果商业银行选择违规经营,由于 $F_2 + P > C$ (如果 $F_2 + P$ 及C,则银监会即使查处银行违规,没收违规所得及罚款加总小于等于监管成本,不能满足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所以 $F_2 + P - C > -L$,此时银监会选择监管,银监会也不存在占优战略。利用划线法,可以看出此博弈不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

再进一步考察这个博弈是否存在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设 θ 代表银监会监管的概率, λ 代表商业银违规的概率。给定 λ ,银监会选择监管($\theta=1$)和不监管($\theta=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pi(1, \lambda) = (F_2 + P - C - L)\lambda + (-C)(1 - \lambda) = (F_2 + P - L)\lambda - C \quad (1)$$

$$\pi(0, \lambda) = (-L)\lambda + 0(1 - \lambda) = -L\lambda \quad (2)$$

令 $\pi(1, \lambda) = \pi(0, \lambda)$,可得商业银行违规的最优概率 $\lambda^* = C / (F_2 + P)$,商业银行以 λ^* 进行违规经营时,银监会将随机的选择监管或不监管,不能在博弈中占上风。而如果商业银行违规的概率小于 λ^* ,银监会的最优选择是不监管;如果商业银行违规的概率大于 λ^* ,银监会的最优选择是监管。

给定 θ ,商业银行选择违规($\lambda=1$)和不违规($\lambda=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pi(\theta, 1) = (F_3 - P)\theta + (F_1 + F_2)(1 - \theta) = (F_3 - P - F_1 - F_2)\theta + F_1 + F_2$$

$$\pi(\theta, 0) = F_1\theta + F_1(1 - \theta) = F_1$$

令 $\pi(\theta, 1) = \pi(\theta, 0)$,可得银监会监管的最优概率 $\theta^* = F_2 / (F_1 + F_2 + P - F_3)$,银监会以 θ^* 进行监管时,商业银行将随机的选择违规或合规经营,不能在博弈中占上风。而如果银监会监管的概率小于 θ^* ,商业银行的最优选择是违规经营;如果银监会监管的概率大于 θ^* ,商业银行的最优选择是合规经营。

因此,本博弈模型存在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lambda^* = C / (F_2 + P)$, $\theta^* = F_2 / (F_1 + F_2 + P - F_3)$,即商业银行以 $C / (F_2 + P)$ 的概率选择违规经营,银监会以 $F_2 / (F_1 + F_2 + P - F_3)$ 的概率监管。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C与 λ 正相关, $F_2 \cdot P$ 与 λ 负相关。C越高,银监会监管的动力就不足,实施监管的概率就小; F_2 越低,银监会监管的概率就会越低,银行被查处可能性越小; P 越低,商业银行期望收益提高,这些都会使商业银行违规经营的概率 λ 变大。同样, F_2 与 θ 正相关, $P \cdot (F_1 - F_3)$ 与 θ 负相关。 F_2 越大,表明商业银行违规收入越高,市场秩序越混乱; P 越小,表明处罚力度越小,市场反应不强烈,效果不明显; $(F_1 - F_3)$ 越小,说明商业银行违规经营被查处后由于信誉下降所带来的损失不明显,自身降低违规的动力不足,这些都会使银监会实施监管的概率 θ 变大。

3.模型分析。对于银监会来说,上面的众多参数中有两个参数可以同时影响到银监会与商业银行,进而影响到 λ 和 θ 的值,其一为P值,罚款额度P的增大,使得监管的概率 θ 降低, θ 降低使得商业银行违规经营概率 λ 加大,然而上面的分析是P与 λ 负相关,P的增大会使 λ 减小,两个结论相互矛盾。可见,单纯依靠提高对违规经营的罚款额度P有时并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其二是 $(F_1 - F_3)$ 的值,对商业银行违规经营被查处后由于信誉下降所带来的损失 $(F_1 - F_3)$ 施加影响,通过公开谴责、舆论监督、经营限制等办法,使得 $(F_1 - F_3)$ 尽可能的大, $(F_1 - F_3)$ 的增大,可以使得银监会选择监管的概率 θ 降低,监管减少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监管成本C,而C的减少又使商业银行违规经营的概率 λ 减小,因为C与 λ 正相关。通过上面的传导机制可以看出,增大 $(F_1 - F_3)$ 值,既可以实现银行监管的低成本,同时又可以降低商业银行违规经营发生的概率,能取得较好的效

果。从以上分析可知,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与银行违规经营的收益成正相关,即银行违规经营所得越多,银行越容易违规经营,越需要监管部门的监管。实施监管的概率与银行受到的违规处罚负相关,也就是说如果对银行的违规处罚较大,银行的期望收益降低,从而银行的违规经营的概率就变小,从而可以适当降低实施监管的概率,而若实施监管的概率较大,则可以适当降低对银行的处罚,两者有一个类似于互补的关系。

(二)银行和监管部门之间的无限期博弈

1.模型假设。(1)博弈双方信息不完全:监管部门和银行在博弈中对其对手的特征、战略空间、支付函数不完全了解。(2)博弈双方信息不对称:银行对自己的各种信息具有先天的优势,而监管部门对银行的各种信息的取得成本是很高的,这决定了监管部门和银行之间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3)博弈双方同时行动,但是后一阶段的行动选择依赖于以前各阶段的博弈结果。博弈双方都可以通过观察对方以前的行动获得有关的某些信息,修正自己的判断。

2.模型求解。首先我们看第一阶段的博弈。假设监管机构有两个选择:从严监管和从松监管。银行有三个选择:违规经营、合规经营和创新经营。各种情况的得益见表2。

表2 银行与监管部门之间的无限期博弈收益矩阵

		银行		
		合规经营	违规经营	创新经营
监管部门	从松监管	$\theta - C_s, R$	$Rw + F - C_s, R - F$	$\theta - C_s, Rc + R$
	从严监管	$-C_y, R$	$Rw + F - C_y, R - F$	$-C_y, R$

表2中 θ 为监管部门的休闲收益, C_s 为从松监管时的成本, Rw 为银行违规时的额外收益, F 为银行违规时的被罚款项, R 为银行合规时的收益, Rc 为银行创新时的额外收益, C_y 为监管部门从严监管时的成本。

当博弈重复进行时,监管机构可以采取“冷酷战略”。对监管机构来说,即(1)开始选择相信银行,对银行从松监管;(2)选择相信银行直到银行违约,然后永远不相信银行,即对银行一直实行从严监管;(3)假设银行收益的贴现因子为 ρ , ρ 表示银行等待未来收益的耐心程度。对银行来说,首先随机选择违规经营或者合规经营或创新经营,如果某一时期违规经营被惩罚,由于预期监管部门会永远实行从严监管,则以后永远选择合规经营。

如果银行第 m 期违约,以前的各期选择是创新经营,得益为:

$$(R+Cc)\rho + (R+Cc)\rho^2 + \dots + (R+Cc)\rho_{m-1} + (R-F)\rho_m + R\rho_{m+1} + \dots \quad (3)$$

如果银行第 m 期违约,以前的各期选择是合规经营,则由表2可知,其收益小于(3)式,因此是劣战略,理性的银行不会作出这样的选择。

如果银行一直选择创新经营,则根据前面的监管机构的战略选择规则,监管机构将一直选择从松监管。假设银行能预期到自己一直创新经营,则监管机构会对自己从松监管,则此时由于银行有宽松的经营环境,有利于金融创新,收益会较从松监管时的收益高一些。

$$(Rc+R)\rho + (Rc+R)\rho^2 + \dots + (Rc+R)\rho_{m-1} + (Rc+R)\rho_m + (Rc+R)\rho_{m+1} + \dots \quad (4)$$

如果银行一直选择合规经营,根据规则,监管部门会一直实行从松的监管,由表2可知,银行的收益要小于(4)式的收益,因此,理性的银行也不会选择。经过比较可知,(3)式<(4)式成立,即一直创新经营是银行的最优选择。而银行创新经营时,监管部门从松监管也是最优选择,因此这是一个纳什均衡。

3.模型分析。从监管者角度考虑,监管机构为了自身以及全民的利益,避免银行违约,必然要求银行提高盈利能力、增加守约经营所得,加大违约成本、降低违约经营所得,提高信息公开

的透明度,提高对银行的监督能力。从而要求银行加强内控建设,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增强获利能力、树立良好的信誉。

从银行的角度考虑,银行的信誉是银行经营的根本,只有取得监管机构的信任,才能避免监管机构的过严监管,从而有利于金融创新,以便获得更多的收益。若用银行市场风险水平的高低来衡量银行声誉的好坏,则银行市场风险水平低说明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加强了风险管理,尽量避免从事高风险的投资,银行声誉好,银行的市场风险高说明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忽视风险管理,盲目从事高风险投资,银行声誉不好,监管机构从严监管银行,从而不利于金融创新。在这个博弈中,银行先向监管机构公布自己的市场风险,监管机构根据该指标以及自己的标准对银行的安全性做出预期,然后选择自己的行动。如果银行通过加强经营管理,强化内部控制等措施降低市场风险,尽管银行会为此付出一定的成本,但监管机构预期银行的安全性好,继续保持对银行的信任,其收益会比较大,如果银行为了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盲目进行高风险投资,使市场风险提高,尽管银行会因此获得一些短期利益,但监管机构预期银行的安全性较差,不再信任银行,其收益会比较小。

三、结论

银行稳定是金融稳定的关键,也是一国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尤其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占有支配地位,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是否拥有健康和富有竞争力的银行体系对于我国而言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目前,我国正在逐步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和逐步实现资本项目的自由流动,对外开放银行业所带来的各种潜在风险也十分迫切。银监会如何在既定监管体制和法制框架下,如何宽严适度地实施监管,仍是摆在理论和实务界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此,本文运用了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如何才能使得监管部门和银行双赢,使双方处于均衡状态。一个好的银行监管制度必须充分考虑到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成本和收益,使其利益共享,促进我国银行业的健康发展。

1.构建风险管理体系。第一,银行要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银行应该通过各种方式,为自己设计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科学有效的决策系统、责任分离的执行系统、相对独立的监督系统,从而有效防范决策失误、执行失真、监督失灵和保障失效等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增强自身抗击风险的能力。

2.建立规范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充分的信息披露是市场约束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针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现状,我们应参照巴塞尔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督的核心原则》的要求,制定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规则,强化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法制观念,统一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内容和范围。监管当局必须加大对隐藏信息者的处罚力度,对信息的虚假披露和不按期披露进行严格处罚,以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促使商业银行依法向监管部门及时、全面、准确地提供报表和资料。此外,也可发挥外部中介机构如外部审计部门等市场因素对银行经营管理的约束作用,提高信息透明度。同时,要进一步改革会计制度,提高会计制度的透明度、可信度以及与国际通行准则的统一程度。

3.建立银监会与中央银行的协调机制。中央银行既是货币政策的制定者,也是银行的最后贷款人,与银行监管有难以割舍的联系。无论是货币政策决策,还是银行监管决策,都是基于对银行体系等大量信息分析的基础之上。只有建立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共享的金融数据库,实现信息高度共享,才能实现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协调作用。若二者部门内目标冲突转变为部

门间冲突,则无疑会造成银行监管交叉或重复,加重银行负担,造成资源浪费。因此,一方面要加强银行监管信息的交流,进一步完善信息网络,搭建新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尽快建立统一的银行监管数据库系统,实现信息共享;另一方面,加强中央银行与银监会双方的协调与合作,尽可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监管的效率。

4.建立科学合理的存款保险制度。在我国由于中央银行对所有银行的隐形存款进行保护,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公众和银行的利益相关者对银行的市场约束力,同时也使银行产生很大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适当的存款保险制度,这有利于强化我国市场约束的力量、实施最优市场约束水平,进而实现社会利润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 Lindgren C., T.J.Balino, C.Enoch, A. et al. Financial Sector Crisis and Restructuring: Lesson s from Asia, Working Paper, IMF, 1999.

- [2] Mailath, Mester. A Positive Analysis of Bank Clos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1994, 3(3): 272- 299.
- [3] Martin A. Liquidity Provision vs. Deposit Insurance: Preventing Bank Panics Without Moral Hazard[J]. Economic Theory, 2006(28): 197- 211.
- [4] Matutes C., X.Vives. Imperfect Competition, Risk Taking and Regulation in Banking[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8(44): 1- 34.
- [5] Merton R.C. An Analytic Derivation of the Cost of Deposit Insurance and Loan Guarantees[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977(1): 512- 520.
- [6] 蒋海, 刘少波. 信息结构与金融监管激励: 理论与政策含义[J]. 财经研究, 2004(7).
- [7] 李涛. 商业银行监管的国际比较: 模式及影响[J]. 经济研究, 2003(12).
- [8] 沈坤荣, 李莉. 银行监管: 防范危机还是促进发展[J]. 管理世界, 2005(10).
- [9] 吉本斯. 博弈论基础[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10] 陈学彬. 金融博弈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 [11] 陆磊. 信息结构、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 当前金融监管制度选择中的理论问题[J]. 经济研究, 2000(12).

(责任编辑: X 校对: F)

(上接第 26 页)代表性,从而使得本文的研究结论有一定的普遍性,能够较大程度上解释山东省的农户鱼产品的消费行为。

笔者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方程(3)(即 Tobit 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 2:

表 2 Tobit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边际效应(全样本)
gender	0.62* (0.32)	0.48* (0.25)
age	0.03* (0.01)	0.02* (0.01)
education	-0.14* (0.06)	-0.10** (0.04)
income	0.004*** (0.0002)	0.003** (0.0002)
fish	0.02 (0.06)	0.02 (0.05)
constant	-4.96** (0.998)	-3.80*** (0.765)
Sigma=2.54 (0.11)		
LR X ² =239.01***		
Pseudo R ² =0.1666		
Log Likelihood=-597.8199		
Number of obs=260		

注:***表示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0.05 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0.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参数估计值的标准差

表 2 的估计结果表明,除了受访农户常食用鱼类产品 2008 年的平均价格(fish)以外,模型的各个解释变量(自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受访农户的性别(gender),受访农户的年龄(age),受访农户的 2008 年农业纯收入都对农户消费鱼类产品具有正向的影响,然而受访农户的教育年限(education)对鱼类产品的消费具有负面的影响。这些结果告诉我们,样本中女性农户对鱼类产品的消费需求大于男性农户,年长农户对鱼类产品的消费需求也大于年轻农户,农业纯收入越高的农户对鱼类产品的需求大于农业纯收入低的农户。但是,教育水平高的农户对鱼类产品需求反而不如教育水平低的农户,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教育水平高的农户更注重膳食平衡,因而对单一类食品的需求没有特别的偏好。

四、结论

本文首先从经济收入、消费习惯、水产品的加工程度等主要因素对我国农村居民水产品消费的影响进行了探究。分析表明:

第一,收入与消费支出的关系基本成正相关关系,即收入增加自然会带动消费支出的增加。但是,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

开始呈现多元化趋势,在水产品消费上的支出开始保持稳定,也就是说水产品的消费量处于一个临界点,即开始由数量型向质量型消费转变。因此,如何突破这个临界点,以刺激我国农户对水产品更多的消费,确实需要我国水产企业及相关单位在提高水产品品质,丰富水产品种类等方面下功夫,以吸引更多的消费。

第二,我国居民的鱼类产品的消费习惯的确影响了鱼类产品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然而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的改变通常较为被动,如果鱼类生产者或销售者不改变最终所售鱼类产品的形式,我国居民对鱼类产品的消费习惯很难发生质的变化。因此,这就要求我国应加快建立起现代化的鱼类产品加工企业或体系,以便向市场出售经过加工的净鱼肉(无鱼刺或仅含有微量鱼刺)产品。同时相关部门也应应对消费者存在的消费误区进行解释说明。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山东省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户对鱼类产品消费的因素。分析表明,山东农户对鱼类产品的消费需求呈现较大的差异化倾向,这种差异化体现为男女性别、年龄大小、教育程度高低、收入多寡会导致鱼类产品的消费量的差异。但是鱼类产品的价格对鱼类产品消费数量并未呈现显著影响,这说明农户对鱼类产品的消费弹性较低,总体消费热情和消费动力不高。因此,未来需进一步拓展鱼类产品市场,加大消费者对鱼类产品益处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孙富国, 鹿丽. 中国水产品消费市场影响因素分析[J].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6): 98- 100.
- [2] 中国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 [3] 王瑞泽, 纪宏. 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5(5).
- [4] 林江鹏, 刘旺霞, 董永明.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关系的实证研究——兼论影响农民收入及其差距的因素[J]. 经济问题探索, 2007(4).
- [5] Tobin, James. Estimation of relationships for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J]. Econometrica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1958, 26(1): 24- 36.
- [6] 中国统计局. 山东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 Z 校对: Q)